

记述中国运河知识的扛鼎之作

——评《中国运河志》

段柄仁

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运河志》，洋洋9卷11册，包括《总述·大事记》《图志》《河道工程与管理》《通运》《城镇》《社会文化》《人物》《文献》《附编（上、中、下）》，版面字数1396万，是自古及今中国运河知识的总结性汇集，是以志书形式总揽中国运河历史与现状宏大的文化工程，其资料的丰富性、可靠性、开拓性和编纂的创新性，透露着编纂者的勇气、执着、艰辛和社会担当精神，无论从运河学角度还是地方志编纂角度，都可称当代中国运河知识和文化出版事业的扛鼎之作。

一

说这部志书是中国运河知识的总结性汇集，不仅因为它体量巨大，是超千万字的鸿篇巨制，也并非因为它记述内容丰富、地域宏阔、时间漫长，几乎与有确切记载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同步，主要是它对前人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存，做了广泛深入的收集整理，尽心尽力的选择考证，在对比研究基础上去繁存精，选用精粹资料，提取规律性认识，力求以科学的编纂方法，构建运河知识宝库，不仅对读者展示可靠、具体的运河知识的感性认识，也有全局性、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在这部志书的总述、概述、无题述和具体记述中少量的点睛之议中，都有明显感受。特别是全书的总述，以高度的概括性、清晰的论述性，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地展现中国运河开凿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及其特点。开宗明义先对中国运河作了国际比较，点明中国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的地位，指出中国运河以路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工程之伟大而艰巨，堪称独一无二。然后对先秦至民国每个时期的主要河段都进行简要叙述，使读者对重要运河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有个宏观认知。水源供给、地形高差、河流交叉是运河开凿和运营的三大难题，总述对此作了专门论述，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在利用自然过程中的智慧和毅力。历代对运河的管理制度，是先人留给我们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也在总述中作了扼要陈述。特别是中国大运河的开凿、运行及其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影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总述以较大篇幅从三方面给以回应：一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起了较长时间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二是对中国南北联系，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三是造就了以交通贸易为主要功能，对国家繁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中城市，构成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文化昌盛的城市带。对近百年来运河的变迁和未来的展望，总述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应特别指出的是，总述对中国大运河这个傲视全球的文化瑰宝，并没有一味地唱赞歌，而是在作了满腔热情肯定颂扬之后，也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其负面影响。明确指出，“运河是人类对自然界按自己的意愿改造的水利行为，有的是顺乎自然规律的，有的则未必，甚至是违反自然规律，最后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由于人类干扰自然行为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报复有时会经过很长时间才反映出来，因此往往是当代受其利，子孙受其累，当政者往往为一时之利之趋，而不顾及后代了”（《总述·大

事记》124页)。因阻断河水自然流向而造成的水旱灾害,时有发生且愈来愈严重;因开凿运河和保证水运与民争地争水,造成与农业、农民的矛盾不断出现,且愈来愈尖锐等,都是不争的事实。总卷能在近些年社会舆论对大运河一味高调赞歌声中,指出其负面影响,坚持了可贵的学术品德。

对中国运河知识的总结性汇集,总述只是作了大事大略、提纲挈领的论述。在此之下,还有与之相接的各卷的概述,对中国运河知识的某个范畴作了进一步展开的更具体更深入论述,应是总结性汇总的第二层次;每个分卷的一些章节部分还有长短不一的无题述和少数内容的结论性和解释性之语,是在更小范畴内的具体化论述,可称为第三个层次。以总述、概述、无题述统率下,展开了运河知识广阔的、分门别类的具体记述和一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补充,构成了迄今为止在文化史上第一部对中国运河作全面的总结性著述。这不仅是文化领域的珍贵硕果,也是对我们先人功勋的肯定和致敬,对今人和后人也提供了丰富精确的有关中国运河的基础性知识,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国运河,特别是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做出知识层面的基础性贡献。

二

资料的丰富性、可靠性、开拓性是这部专著突出的特点。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属性。志书的质量高低,首先着眼于资料,着眼于资料是否全面完整、真实可靠和是否发前人之未见、用前人之未用,并使有用资料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中国运河志》的编纂,在这方面下了苦功,首先是千方百计尽其所能地对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可以说几乎搜遍了国内馆藏的文献典籍、档案资料、近代研究资料和实物资料,包括运河的开凿、变迁、运营、管理及历史背景资料 and 各类关联资料。除国内馆藏外,还到国外搜寻,除文字和实物资料外,还有各类图像资料,除死资料外,还深入民间走访文化传承人和文物遗存,研究活着的运河文化的形态。功夫不负有心人,资料的丰富性为这部志书的编纂成功,并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对志书编纂而言,广泛收集资料,多多益善,只是起步,还需要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筛选鉴别,核定其是否全面真实,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全面性就是不可有重要遗漏,及时拾遗补缺,择优汰劣,同时审视资料的价值,以其高低选择应用。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是志书质量的第一标准。存真求实是志书编纂的首要原则,志书采用的资料必须有根有据,可查可考。《中国运河志》对资料进行了精心鉴别,凡是使用的资料,多有出处,有些重要内容,还作了注释或说明,以增强其真实性。

在丰富可靠资料中,如果发掘出前人未发现、使用的珍贵资料,将使志书更有价值。《中国运河志》收集使用了不少新鲜资料,特别是《社会文化》卷,不少资料是前人未发现和使用过的。《图志》中的运河全图、运河分段图、运河泉源图、运河漕运航运图、运河工程图,虽然不少是散见于其它图书集中,但把它们挑选后,集中有序地编成图集,在运河著述中,还是首次,在志书中也很少见。

有了丰富、可靠、新鲜的资料,还需精心编纂,按照特定体例结构和给定的篇幅,选择适用资料,放在适当的篇章中,使其融会于整体之中。《中国运河志》按现代志书体例,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首设总述,论述全书的主旨和主要内容,其中对中国大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重要节点和变迁以及负面影响,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其观点和结论,都是以典型资料做支撑。大事记是按历史发展顺序对运河大事的资料进行的选编,是中国运

河生发的纵向主线的简约知识，它和总述编为一卷，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自然过渡，两者结合给读者对中国运河以更深的全局性认识。随后是作为总述和大事记佐证的《图志》，是与运河文字表述相辅相承的形象表述。作为运河主体的《河道工程与管理》，运河主要功能的《通运》，因运而生的《城镇》和《社会文化》，推动运河生发的《人物》，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运河横向展示的主体知识。最后是《文献》和《附编》，前者是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纪要和文献，后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运河文献史料选录并附有今人论著索引，从史料方面为其他各卷起支撑及补充，又可为读者提供关于运河的基础知识、原始文献及资料线索。

三

对中国运河文化的总揽和深耕以及在编纂方面的开拓创新，使这部志书昂首屹立于优秀文化工程之列，也填补了中国运河史上创修全局性当代志书的空白。说这部志书是中国运河文化的总揽深耕，首先是因为编纂者把运河文化的生成和变迁放在了中华文明发展变化这个大格局中，放在了巩固国家统一、民族交融的大事业中，从广阔的社会和深邃的历史中，去寻觅运河生成和发展变化的动因，研究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探索可资今人和后人借鉴的规律性认识，使这部资料性著述成为知识含量很高并不断闪烁思想光辉的志书；其次是因为它在海量而价值不等的资料中，挑选出运河各个时代中文化含量较高并有代表性、节点性的事物重点记述，使运河文化的重点、特点、亮点得以较好展示；再次是对作为运河文化主体和主线的水道、水工设施、运营和管理制度与方式，对各个朝代千变万化复杂难理的定性、定位、定效果的问题，作了研究和梳理，使之比较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尽可能避免十分容易出现的时空倒错问题。

说这部志书具有创新性，首先是因为它既不是志书续修、补修，也不是在原有内容上的重修，而是创修之作。创修多是特定内容的第一次编修，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整体还是局部，都有开拓创新之处。《中国运河志》是对前人所记录和今人所口传的运河知识的集大成，把纷繁复杂的知识，从分散到集中，从庞杂到精选，再加上认识上的提炼概括，本身就是创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社会文化》卷，在当代志书的编修中，社会部分一直是困扰编纂者的难点，究竟它应包含哪些内容？和经济、政治、文化如何区割？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是莫衷一是，有广义、狭义之说，也有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之论。《中国运河志》从运河自身特点出发，把因运河而生的独特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归为一卷，采取了社会和文化在内容上合二而一，又把两者在结构上作了一分为二的区割。在社会范畴上，运河催生了运军、水手、商人、船夫等群体，形成了与传统乡土社会有鲜明差异的水上社会和沿岸社会。在这些群体中，又产生出以行业为纽带的会馆、会所，与运营密切相关的家族组织，以职业为纽带的帮会组织，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运河百业和独特的衣食住行以及伴随运河兴衰的运河社会变迁。这些记述都是以运河独特环境为基础、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梳理出了运河社会的鲜明特点，这在当代志书中是很少见的。在文化范畴上，这部志书既有文化活动又有意识形态，梳理为岁时与信仰、娱乐竞技、民间语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五类文化形态。这五类文化形态和五方面社会形态，既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又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文化以社会为母体，社会靠文化来支撑，两者共生同体，互相支撑，形成了独特的结合体。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志书编修上的创新之笔。这部志书还有把运河工程管理和运营管理的制度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制度建设是运河

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把3000年历史长河有记载的千变文化的管理制度梳理清楚，是运河志书编纂上的拓荒之处。对制度建设进行梳理、记述，不仅是运河文化不可或缺，有助于对中国历史的文明演进作深入理解，增添新的内容，也会为当前和以后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这部志书在编纂结构上也有所突破，这就是在逻辑顺序结合紧密的8卷之外，增加了独立性较强的《附编》卷，并放在《文献》卷前面，作为第八卷。这是回顾和总结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专卷。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事，完全可以与运河志分开来，编成独立一部志书出版。但编纂者突破了志书一般不可有志中志的习惯性做法，以一部在时空定位上独立的著述，纳入志书结构序列，是否不顺？现在看，把申遗单独成志固然可以，但在运河志中，把它作为其中一部分，可使运河志更充实，增加了含金量，也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件大事纳入中国运河的大视野中，并有更深入的理论和更全面的资料支撑，使读者对大运河申遗的重大意义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附编》和其他8卷的内容表面上有区割，实际上血肉相连，特别是它的3个文件，《大运河遗产保护和总体规划（2012—2030）》《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都是运河志应纳入的珍贵文献，把对大运河申遗的回顾与总结，作为《附编》纳入运河志中不仅不多余，而且在必然之中。

四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运河志》规模宏大，又是众手成书，编纂成功，受到读者欢迎赞赏，实属不易，但同样有可商榷之处。主要是：

（一）名实差异问题。这部志书冠名为《中国运河志》，其内容理所当然地应是记述中国全境古今运河。但实际上虽然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与大运河关联的知识，但对大运河之外的运河，除灵渠和关中漕渠外，很少见到。不仅没有个体记载，连概述性记述也未出现。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除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八省市的大运河外，其他省市都在不同时代开凿过运河，特别是自然河流较多的地区，常以开凿运河连接自然河流，以弥补其交通运输的不足。这些在省、市、府、州、县的综合性志书和《水利志》《自然资源志》中多有记载。比较突出的是人所共知的战国时期秦国在四川由李冰父子开凿的都江堰和在成都平原形成的郫江运河和检江运河等，就不见记述。如果说都江堰作为水利工程不被列入运河范畴，郫江和检江是由人工对原有水道挖筑而成，在文献中明确记载，它们除用于灌溉外，还可“行舟船”，不被列入运河志就难以言说了。事实上都江堰工程的建设，不仅为成都平原的引水灌溉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交通运输、开发水源，特别是开凿运河扫清了障碍，把它纳入运河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又如志书记述了灵渠，而且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是应当的。但对唐代开凿的、与灵渠相近并被与灵渠并肩称为南北二陡河的相思埭运河，也未记载，等等。冠名为“中国运河”，但却忽视了多数省市的运河，应是志书总体设计上的漏洞。这一失误还表现在对“中国运河”和“中国大运河”概念的模糊不清上，不少篇章中，常常以“大运河”替代“中国运河”。最突出的是作为志书核心内容的《河道工程与管理》卷，共分12章，前10章是大运河的10个段落：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然后增设了灵渠和关中漕渠两章。概述中开宗明义就是“中国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代”。可见此卷着眼点就是中国大运河，而非“中国运河”。志书编纂讲究“简而能周，博而能详”，既简约又要全面，广博又能具体。《中国运河志》把主要篇幅放在中国大运河上，突出书写这项中华文明瑰宝和世界文化遗产，是应当的。但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应照顾全面。缺

少对大运河以外的多数省市运河的记述，造成了志书内容的不完善，导致了名实差异，是令人遗憾的。

(二) 最早运河的认定问题。作为《中国运河志》，对中国第一条运河或者说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第一条运河应有个统一的认定。如果没有统一的认定，也可客观地把学界主要的不同意见记述下来。在这部志书中，编纂者是有认定的，但却各说各话，呈现认识不一的纷乱状态。在大事记中，把泰伯渎列为第一条，“商朝末年（约前11世纪），传说泰伯、仲雍为避王位，南奔吴地（今江苏苏州），由今无锡向东经梅村镇开挖运河，后人称之为泰伯渎”（《总述·大事记》卷157页）。这里认定的泰伯渎是中国第一条运河。《人物》卷也把泰伯列为第一位，也说“泰伯渎是中国运河的开端，历史最为悠久”（《人物》卷26页）。而在《图志》卷的概述中却说“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学会了开凿运河。修凿运河的历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图志》卷2页）。这与泰伯渎开凿相差了500多年。在总述中是又一个说法，“据可靠的资料，中国最早开凿运河的地区在今江淮流域。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时代，地处淮河下游的徐国（今江苏泗洪县境），为了与平原各国交往，‘通沟陈蔡之间’，就是在沙汝之间开凿运河直接通航，不必绕道淮河”。十分明确地把中国的第一条运河认定为陈蔡运河。在戴逸先生所作的序言中也说“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可以追溯到西周穆王时期（前976—前922年）”。同一部书中，对同一事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出现了3种不同说法，给读者造成了思想混乱。

(三) 《大事记》琐碎且不平衡问题。大事记是志书体裁之一，是按年月日时序，对志书内容范畴的大事、要事给以逐条简要记述，可称志书之经。《中国运河志》给大事记以较大篇幅，记述了从西周末到2017年中国运河的开凿和变迁本身发生的事件和与运河有关的事件，内容多是摘录于各类典籍文献中。可以看出编纂者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采摘有关中国运河知识的执着与艰辛。总体上看，对隋唐五代之前的条目，选取的大事、要事较为妥当，记述也比较清楚、完善。但之后，特别是明、清和民国时期，资料大都摘取于《续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各类志书等古籍中，但对什么是大事、要事缺乏分析提炼，把凡是与朝廷特别是皇帝、重臣有关的事，都作为大事、要事以录取，不少条目有头无尾，上下相接不上，读者很难理清事件的原委。在近代部分，内容大都抄录地方年鉴，大多是与运河关联的文化活动。有些活动，诸如某地的文化艺术节在运河博物馆开幕、运河某段因雪紧急停运而封航、放鱼节在某运河举行等，都作为大事、要事，十分勉强。这些不仅使文字臃肿，也使认定大事、要事的标准相差过大，造成记述的不平衡、不公正。此外，这部志书的述体部分交叉重复较多，多数编章都对大运河作评述且文字大体相近、相同。当然，如此巨大篇幅，又是分卷独立编著，有些重复是难以避免的，但此书的重复不少是可以压缩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本文责编：周全